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By 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Bilingual Edi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159pp.

馬思中、陳星燦編著，《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英中文雙語版，斯德哥爾摩：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2004年，159頁。

2004年秋季，瑞典東方博物館名為「中國之前的中國」常設展覽開放，馬思中和陳星燦合作編著本書，以配合這個展覽。成立於1926年的瑞典東方博物館，建立在由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丁文江領導的中國地質調查所的第一批中國史前考古發掘品基礎之上。安特生發掘仰韶村而提出中國考古學第一個考古學文化，即仰韶文化的概念。他所採用的田野工作和形式分析等方法，對中國考古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他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假說，更引發了空前大討論。如果說20世紀20、30年代的傳播論主張全球各地的人類文明均由西亞傳播擴散而來是謬誤的話，那麼當時試圖強調文化原生性的中國學者既排斥中國文明西來說，又持中原文化一元說的觀點，在邏輯上顯然也是矛盾的。這種觀點以「龍山文化形成期」為主要論點，一直未遭到任何置疑，直到1980年代初，蘇秉琦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才使學界思路得以打開。區系類型以多元中心建構中國史前文化結構，但又不排斥文明之間的交流，如是才能全面解釋現有的考古材料。然而區系類型學說的施用範圍仍然局限在中國本土，若把其觀察對象擴大到整個歐亞大陸，考察中國本土文化與其他文明類型的關係，是否會有新的發現？區系類型並沒有做出更多的解釋。

在此背景下，本書題名《中國之前的中國》是頗具深意的。在第一章「前言：中國之前的中國」中，馬思中指出「中國之前的中國」（China before China）暗含了多重語意。「中國」不僅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名稱，還是一個疆域上的界定，同時又是一種文化的象徵。「中國之前的中國」在此可理解為一個未知的過去，古人並沒有現代政治疆域概念，文化交流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作者試圖討論「中國」出現之前在「中國」的地域上的歷史：誰住在那裡？他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和今天的中國人有什麼關係？作者認定安特生的發現正是這種文化的最好物證。這拋開了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對考古的定義，從更廣闊的範圍看待中國史前文化。同時作者也強調題目的另

一層含義：這些遠古文化中的某些成份成爲後來的中國文化的組成部份。以「中國之前的中國」相稱，體現了作者開放的態度，也表明中國史前史研究的新取向。

本書第二章「中國史前史的發現和東方博物館收藏之源流」中，馬思中採用年表式的敘述方式，以安特生和丁文江爲中心，講述中國史前史的重新構建。儘管至今仍無安特生的傳記，但多本通俗性著作對這段歷史都有所涉及，在此基礎上作者總結了安氏的學術活動和交往。19世紀末年，西方世界興起了科學探索和探險活動，安特生的探險活動並不是從中國開始，但在中國的經歷最終導致他學術興趣的轉變。而丁文江是當時中國第一批接受西式學術訓練的學者。在共同的學術追求下，兩人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並在中國引發了一場考古學的革命。獲瑞典官方和學界支持的安特生，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展開田野考察。在與中國變動頻繁的政府交往和他的學術考察活動上，他得到丁文江的很多幫助，同時與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往來頻繁。1921年仰韶文化的發現爲安氏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此後安特生的學術活動便和仰韶文化緊密相連，他隨後提出了西來假說，並多次身體力行地加以考察，其間不斷調整他對仰韶文化的解釋。作者在此並未詳細討論安特生的研究論述，亦沒有過多評價他在田野考古上的得失，而是將學人與文物的歷史巧妙結合，爲我們描繪了中國考古學的草創期的圖景，同時密切關注由安特生發現的這批文物顛簸流離的命運。

與此相對應的是由陳星燦撰寫的第三章「安特生在中國的命運：從學者到學者」。本章重點論述了前一章中沒有詳細展開的文明西來說，以及隨後在中國長達數十年的文明起源問題的討論。在仰韶村的發現之後，仰韶文化從何而來，它與中國歷史文化有何種關係成爲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安特生首先認定仰韶文化是中華遠古文化。爲了進一步解釋仰韶文化的源流，安特生在仰韶和中亞、西亞的彩陶文化之間建立傳播關係，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西來假說。由於假說觸及了中國文明起源這個敏感的話題，同時因爲安特生在研究方法和技術上的不完善，從20年代開始，以李濟、傅斯年爲首，很多學者懷疑安特生的西來假說，而不斷更新的考古發現也最終推翻了安特生的西來說。1950年代以後，在政治浪潮的衝擊下，安特生被認定爲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幫兇。直到80年代中期，中國學界才最終在學術上給予安特生以客觀的評價。安特生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不僅在於他確證了中國的史前史，更重要的是他使考古學進入中國史學家的視野，古籍中關於中國早期王朝的記錄受到挑戰，考古學成爲瞭解中國古史的必由之路。而西來說在事

實上刺激了中國史前考古學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學者對安特生及其遺產前後迥異的態度的變遷正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發展的一個縮影。

馬思中和陳星燦合著的第四章「『半山頭人』和邊家溝墓」中，作者簡要介紹了展覽內容之一的「半山頭人」的保存現狀和邊家溝墓的發掘情況。第五章「結束語：一所歐洲博物館所藏之亞洲文物——東方博物館收藏之未來命運」，進而討論了館藏文物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未來命運，即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東方博物館將如何管理保留在瑞典的收藏品。在第二章中作者曾多次提到安特生和丁文江以及其他學者之間的友誼，並不忘提醒中瑞雙方簽訂的種種關於文物的協議，同時對於安特生發現的這批文物的去向給予特殊的關注，並且簡要敘述了為了保存這批文物而成立的東方博物館的早期歷史。作者在本章中進一步提出東方博物館與許多其他西方博物館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基本收藏是建立在輸出輸入雙方認可的協議和互相信賴的基礎上的。但是馬思中也誠懇地承認，即便如此也不能改變或者抹煞殘酷的歷史事實：東方博物館的藏品仍屬在力量和利益原則下被劫持的文化遺產的碎片，這是東方博物館不能逃避的道德問題。為此，東方博物館對其藏品認真的整理和開放的態度是值得尊敬的。

本書的寫作目的是考察安特生的考古活動及其收穫，作者關注中國史前文物如何、以及為何被發現的故事。一種以文物為主體的敘述方式讓我們耳目一新。作者不再以文物作為故人舊事的注腳，而是將文物的發掘到收藏的整個過程作為本書的重點，發掘者、保護者以及研究者圍繞着文物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和言論構成一條具有獨立意義的學術史線索。在資料上，本書收入了相當數量的新史料，包括安特生與中瑞官方和學者之間的私人通信、有關文物的發掘情況和保存狀況的珍貴照片以及安特生的考古活動筆記和文件。但遺憾的是，受到篇幅限制，第三章中國學者對安特生的分析略顯簡單，且三大時段的劃分更多體現的是中國政治氣候的變遷，一些學者在60年代的違心之言恐怕不能成為他們對安特生態度轉變的依據。同時本書其他章節中也遺留了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丟失的文物究竟現在何方？什麼原因導致這些文物的流失？進而引發的對近代中國考古學界的文物觀念的思索等問題，作者在書中雖略有提及，但並沒能給出清晰的說明，這都是讀者期待在作者們未來的著作中予以詳細討論的。

黃菲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